

第三代领导集体 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贡献

刘开寿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摘要:老一辈革命家对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江泽民提出了“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新论断;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方针和工作格局;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论述了从严治党方针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江泽民;新贡献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2)03-0053-04

The 3rd 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 Collective's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of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 (BOPSACG)

LIU Kai-shou

(The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The old generation revolutionis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BOPSACG. Jiang Zemin, general secretary of CPC, points out: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s a grave political battle relating to the life and death of party and state. The 3rd leaders collective further nails down the guidance thought, goal requests, basic guideline, and work pattern of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he BOPSACG. Jiang Zemin emphasizes that before manage state affair, must manage party affair in advance, and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the guideline of stricter managing party affair. The Decis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Building of Party Style*, which is made on the sixth plenum of the 15th central committee, is another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BOPSACG.

Key words: the building of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 Jiang Zemin; new contribution

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不但提出了科学的理论,而且创造了一些党

风廉政建设的好形式,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三大优良作风,特别是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党历经千难万险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对党风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经典文献中,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的党风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概括出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

收稿日期:2001-12-31

作者简介:刘开寿(1944-),男,重庆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教授,主要从事党建研究。

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指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满怀信心地指出,共产党一定可以跳出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曾一再重蹈的“历史周期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同志务必要保持优良的传统作风,特别要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袭击。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歪风邪气和消极腐败现象。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出现的严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第三次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紧接着,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把这个论断作为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十三大更把这个论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12个基本观点之一,写进了政治报告。

20年的实践证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风问题的这个命题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个命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根据新的实际,对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作出了新的概括,对于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这个命题,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党群关系问题。因为党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党与人民群众,主要是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民心所向,党一定兴旺,民心所背,则党必衰败。也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问题。认识问题不真正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只能是做样子,走过场,决不能取信于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世界上许多共产党的改名换姓、改宗易帜,柏林墙一夜之间的崩溃,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些共产党丧失了群众,丧失了执政的根本,甚至丧失了立足存身的起码条件。中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也表明,尽管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人民群众也从切身体验中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但是,由于一部分干部的腐败,使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能够以“反腐败”为旗号,鼓动起那么多人或参与、或支持、或同情动乱,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予以平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继承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的这笔丰厚遗产,不断提高认识,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二

江泽民提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新论断,把全党对于反腐倡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几乎每次都出席中央纪委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安排、部署和指导这项工作。他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方针的自觉性,务必加强领导。1997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反腐败是“严重政治斗争”的观点。他说:“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同年5月29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这个论断。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论断载入党的正式文献,成为全党的共识。

为什么说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呢?尽管江泽民没有像学者那样列举一、二、三条加以论证,但我们根据江泽民的一贯思路来看,还是可以大致理出脉络。第一,江泽民非常强调讲政治,他一再说“三讲”的核心是讲政治。1995年9月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上的讲话(后来人民日报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为题发表了部分内容),就是从反腐败破题。可以认为,说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首先是因为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识别力、政治敏锐性等等的重大问题。第二,邓小平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是搞四个现代化。而腐败则是阻碍现代化的天敌,不反腐败,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即使“现代化”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反不反腐败、反腐败力度的大小,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还不是政治问题吗?第四,党章总纲和邓小平理论都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我们党同腐败分子(如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的斗争,早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新形势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问题当然属于政治问题。

深刻理解江泽民的这个新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旗帜鲜明地、坚决地、锲而不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三

第三代领导集体还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方针和工作格局。江泽民指出,反腐败斗争的总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

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思想政治教育、查处大案要案、健全制度和严肃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既防范于前,又惩戒于后,打好一个一个的阶段战役,一步一步地把斗争引向深入。

第一,反腐败必须围绕“中心”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要寓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中,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不能离开“中心”,更不能挤压“中心”、妨碍“中心”或另立“中心”。这是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思路。

第二,反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企图下猛药见效,企图用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企图在短期内“根本好转”,都不现实。反腐败只能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只能法治与德治兼施,既教育于前,又惩戒于后;只能综合治理,教育、查案、建制、执纪结合,党纪、政纪、法律并用;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以若干阶段性成果而积大成。总之,既要坚决同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又要努力做好消除产生腐败根源的工作。

第三,反腐败斗争必须突出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江泽民指出:“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重点在领导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一机关三部门两种人”。不是说不反其他机关、其他部门、其他人员中的腐败,而是要重点反这“一机关三部门两种人”中的腐败。因为这些机关、部门、人员中如果产生腐败,“质量”特别高,影响特别恶劣,查办起来特别困难。江泽民常举历史上的例子,说吏治腐败为害最烈。当今哪些机关、哪些人中可能产生吏治腐败呢?只能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有这种可能性,其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对象顺理成章。

第四,反腐败必须认真做好近期的三项主要工作。这就是:督促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着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第五,反腐败必须强化监督机制。江泽民认为,惩治腐败必须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增强党组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江泽民指出,党执政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监督内容也要抓住突出的问题。干部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运用权力、坚持根本宗旨,是不是严格遵守和维护民主集中制,应当成为监督的重点内容。

四

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论述

了从严治党方针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点,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新的武器。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重申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江泽民更是反复强调,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领导干部自己也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多层面分析,他律(“三严”)与自律(“四自”)相比,我们应更着重于他律,也就是党组织治党要严。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没有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对违纪违法者心慈手软、失之过宽。

江泽民强调,落实从严治党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所以,不能仅仅把从严治党的方针理解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方针,它也是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方针。十五大报告从5个方面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第一,严格按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第二,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第三,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第四,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第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必须明确从严治党首要、关键的是从严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只有如此,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普通党员中有说服力,才能真正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

五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新世纪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决定》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抓住作风建设,就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决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们党当前的作风状况,充分肯定了主流,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建设有新的明显的进步,以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

根据《决定》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一贯精神,有这样几点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第一,对目前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问题绝不可低估。《决定》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

应当说,这种概括比较符合实际,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对问题轻描淡写的做法有了很大区别,党内外都基本认同。比较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与基层单位、普通党员、一般群众对党风问题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反差。前者很乐观,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腐的廉政措施“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后者则看到的阴暗面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两者都有片面性,但尤以盲目乐观的危害性更大一些。毛泽东曾经告诫我们,对问题和困难看得多一点儿、大一点儿、重一点儿,比看得少一点儿、小一点儿、轻一点儿要主动一些。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曾经提出要在3-5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后来不正之风反而愈演愈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不能不说是使一些同志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对解决问题的难度绝不可低估。在新的条件下,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难度更大。首先,腐败问题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要完全解决腐败问题,难度可想而知。其次,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这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阶段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无论是体制条件、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社会心理条件,都有很大不同。比如,过去通过政治运动反腐败就能取得成效,现在能行吗?过去许多群众为报共产党的恩情,对干部中的某些违纪行为可以谅解,现在则不但不谅解,反而把少数干部的行为误以为是“党的行为”。再次,执政时间越长,一些党组织、一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越淡薄,迷信权力、迷信上级而不“迷信”群众。如不认真加以解决,长此以往,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的改善就会越来越难。

第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对这“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解决这“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基本措施。问题已经找到,指导思想已经明确,办法也已经有了,又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如果作出了一个好的决定而不打算去照着办,就正象列宁所说的,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一张废纸。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决定真成了“废纸”,那么,我们失去的将是党心和民心,而要重新赢得党心和民心,不知又要花费多少力气!解决“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既立言,更立行,成为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模范。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陈云. 陈云文选(1956—1985)[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编辑组. 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记要(上、下)[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 [5] 编辑组.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C].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
- [6]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7] 编辑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上接第48页)后来在他的《跨越界限》一书中引用了一句拉丁格言:“美是真理的光辉”。他用这句格言来说明美对于发现真理的重要意义。

纵观科技发展史,以美学原则为更高层次的原则指导科学研究的例子举不胜举,尽管科学家的美感直觉和他对真理的认识并不完全等价,但它却是一位杰出科学家所不可缺少的科学品质,它对科学理论的建立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从宏

观系统论概念出发,我们不妨把艺术家看成是形象的科学家,把科学家当作抽象的艺术家。这样,不仅有利于打破文理界限,而且有利于彼此的进一步了解和交流,进而有利于共同探索真理。

参考文献:

- [1] 吕澎. 艺术——人的启示录[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 [2]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